

民國文學

十五講

孫郁

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| 007 |
| 新文學的起點 | 029 |
| 舊派小說 | 049 |
| 舊詩詞的餘暉 | 069 |
| 魯迅的暗功夫 | 097 |
| 新詩之路 | 119 |
| 老舍，靈魂丟失國度的歌哭者 | 155 |
| 曹禺的宿命之舟 | 167 |
| 沈從文的希臘小廟 | 183 |
| 學人筆記 | 199 |
| 梨園筆意 | 217 |
| 左派小說 | 233 |
| 蕭紅與黑土地上的亡靈們 | 253 |
| 舊屋檐下的張愛玲 | 271 |
| 草根與政治 | 289 |
| 後記 | 309 |

清末民初的 文學生態

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。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，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。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，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，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，也增加了新的東西。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。我覺得是對的。我們從文章學、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，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，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，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，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。

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。大家知道，西學東漸後，新觀念進入中國，文人的文章風格就開始發生變化了。在中國社會，八股取士限制了人們的自由表達。千百年來，中國的讀書人寫文章都是一個套路，就是要頌聖，或引經據典，自己的內心隱秘被藏起來。人的心需要自由，可是卻被甚麼力量抑制住了。只是在一些旁門左道的文章裡，在一些私密的辭章裡有心性的自由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民間流傳

的一些小說裡有有趣的東西，是鮮活和生動的存在。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種差別。

到了晚清，桐城派的古文，在整個學界，在文壇，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點，今天看來，這學派學者們的文章都很講究，延續著古風。他們的文章注重義理、辭章和考據，所有的文章裡要有學理、辭章，要有分寸，還要帶上考據之趣。如果這三個元素佔據了，文章應當是好文章。曾國藩在《歐陽生文集序》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時說：「姚先生獨排眾議，以為義理、考據、辭章，三者不可偏廢。必義理為質，而後文有所附，考據有所歸。一編之內，惟此尤兢兢。當時孤立無助，傳之五六十年。近世學子，稍稍誦其文，承用其說。道之廢興，亦各有時，其命也歟哉！」這個流派的文章，掌握了文學的一種規律，應當說很不簡單。古文的表達在這裡有了理論的自覺。

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裡面，文章是有多種可能的。作文應當是自己心靈發出一種聲音，它不是為了外在功名，不是為了虛榮來寫作的。當西方傳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帶來以後，中國的一些文人突然發現，西洋人在表達自己生命感覺的時候，常常能夠抓住自己生命的鮮活的覺態，比如《浮士德》《復活》。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，常常是比較溫吞的、節制的、含蓄的，那種放蕩的韻致卻被遮掩了。

清代後期，文壇與官場被偽飾的文字所包圍，能夠抵抗這種世風者不是很多。大家知道龔自珍這個人是很有學問的，他的詩和文章都很好，也在北京做過小官。他是在整個文學史裡比較獨特的一個人。通常詩詞寫得好的人字寫得也好，龔自珍字卻不好，文章卻很不凡。

他到北京當官後，漸漸厭惡起官場。在回到南方的時候，曾經寫過一首詩，這首詩寫道：「詩格摹唐字有稜，梅花官閣夜鏤冰，一門鼎盛親風雅，不似蒼茫杜少陵。」他說當時滿朝文武都在附庸風雅，但是與杜甫比遠甚。有人間情懷，有個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，很多附庸風雅的人沒有這樣的情懷，表達出現問題。龔自珍的憂患，是文學危機的一種反映。這種反映，在後來的黃遵憲、陳三立的詩文裡都有一些，不過無奈的是，他們的作品還不足以抗拒這股潮流。

晚清人寫文章，尤其是寫詩，是老八股，那狀態永遠超不出唐宋。比如同治和光緒兩帝的老師翁同龢，算是大學問家，但他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少新意。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，買了一冊他的詩文集，閱讀前特別期待，帝師的文章怎麼樣？看完以後就很失望，那些詩實在無味，文章沒有甚麼毛病，可它是非常規矩的，缺乏奇思。比如他有一首詩，叫《壽陽道中》：「一雨動秋潦，客程亦許遲。野花開五色，天氣備三時。走卒慣乘險，征夫常苦飢。太行天下脊，未敢輒題詩。」態度很隨順，人的厚道一看即知。他的詩歌裡感覺到古人套路的連續，自我內心獨特的感受與前人的一些詩歌是重疊的。他是在一種模式裡來寫作，所以這類詩文在晚清，已經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厭惡了。

最早擺脫這個套路的，是那些有出國經歷的文人。1840年後，讀書人改良的觀念開始出現了。文章的理念也隨之不同於過去。我們發現魏源在《海國圖志》裡所表達的對於世界的理解，黃遵憲《日本國志》的思維方式，王韜的《淞隱漫錄》《淞濱瑣話》的意象，以及所運用的

辭章已經跟前人不太一樣了。像郭嵩燾、薛福成、梁啟超、章太炎、章士釗、陳獨秀這些人的文章，已經偏離了明清文人的傳統，有了個性的張力。

黃遵憲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詩人。梁啟超、胡適、周作人都對他的成就頗為肯定。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創辦《時務報》，將梁啟超、汪康年召集於麾下，提倡維新。他與陳寶箴、譚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，思想是極為活躍的。年輕的時候對詩歌創作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：「我手寫吾口」，要創意新路。他在《日本雜事詩》《人境廬詩草》裡表現的境界，與前人不同。王韜在《〈日本雜事詩〉序》中則說：「殊方異俗，咸入風謠。舉凡勝跡之顯湮，人事之變易，物類之美惡，歲時之送迎，亦並纖悉靡遺焉，洵足為鉅觀矣。」道出其間不俗的氣象。黃遵憲在《人境廬詩草》的序言中說：

僕嘗以為，詩之外有事，詩之中有人；今之世異於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。嘗於胸中設一詩境：一曰，復古人比興之體；一曰，以單行之神，運排偶之體；一曰，取離騷、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；一曰，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。其取材也，自群經三史，逮於周、秦諸子之書，許、鄭諸家之註，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，皆採取而假借之。其述事也，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，以及古人未有之物，未闢之境，耳目所歷，皆筆而書之。其煉格也，自曹、鮑、陶、謝、李、杜、韓、蘇訖於晚近小家，不名一格，不專一體，要不失乎為我之詩。誠如是，未必遽躋古人，其亦足以自立矣。